

韓國有關中國政治社會研究的評述

李周炯 / 韓國昌原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

一、序論

從上世紀 80 年代末開始，韓國的中國學研究者們開始探討關於“中國研究”的內容、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方案等問題。進入 90 年代，隨著韓國國內地域學研究熱潮的到來，關於中國的研究也越來越引人注目。韓國的中國研究大概有以下幾個特徵：

第一、通過介紹國外的中國研究，從比較學的角度探討韓國的中國研究所處的學術位置及存在問題。

韓國的中國研究是從模仿西歐開始的，因此韓國的中國研究通過比較和批判外國的研究內容，能夠更加客觀地對待本國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第二、梳理中國研究的發展脈絡。

從 90 年代開始，韓國的中國研究日益擴大。主要按照研究的時期和主題，通過分析統計來介紹中國學研究的推進過程、研究學者和研究組織。

第三、探討研究方法論問題，強調研究的獨創性。

初期的方法論研究方面，克服了以人文學為中心的中國學（Sinology）的傳統方法論，努力探索新的科學方法論。另外，逐漸認識到盲目吸收西歐的研究成果所存在的問題，強調韓國的中國研究應具備自身的獨創性和比較研究能力。

第四、對中國研究的現況進行質量分析和批評。

通過對發表在學術刊物中的中國研究論

文的主題及具體研究內容的分析和批評，探討研究成果等在學術質量方面的發展。

本文將介紹 30 多年來韓國的中國學研究的概況和最近幾年的研究動向，以及韓國的中國學研究的成果和所面臨的新課題。關於最近的中國學研究方向，本文將介紹目前韓國的中國學研究的研究環境，研究隊伍及研究成果。同時分析說明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的主題和其中存在的問題以及中國研究今後的發展方向等。

二、中國研究的現況

（一）研究環境

韓國的中國研究深受國際形勢、國家政策、中韓關係以及中國社會的變化等影響。尤其是在朝鮮半島南北分裂的特殊環境下，韓國與中國的交流也長期被隔絕，因此，相對於美國、日本等其他國家，韓國的中國研究的歷史是比較短的。

韓國的中國研究，是自 1992 年韓中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之後才正式進行的。

1950 年朝鮮戰爭之後，受東西方冷戰體系的國際環境影響，韓國將“反共”作為自己的國家理念，因此，社會主義的中國就很自然地成為韓國的敵對國家，中國研究也相應被列入禁止研究的範圍。

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以後，韓國國內隨之形成一種南北和諧氛圍。在韓國的中國研究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漢陽大學中蘇研究所也是在這一時期成立的。那時開始進行的中國研究，尚不能稱之為一

種地域研究，而是充當了對共產國家也即社會主義國家研究的一個環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 80 年代末。

然而，這一時期韓國國內的中國研究只不過是對西歐中國研究的模仿。尤其受國內外的反共情緒的影響，當時的中國研究未能取得讓人滿意的成果。由於韓國一直到 80 年代都普遍堅守反共理念，再加上當時尚未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中國研究學者們沒有機會獲得關於中國的第一手資料。所以可以說，70~80 年代中國研究的研究環境是十分惡劣的。“研究中國”的學者本身很容易

被誤認為是親共分子。這與同樣選擇反共理念的台灣形成反差。因為台灣很早就成立大陸研究機關，如政治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華經濟研究院、法務部的調查局、行政院的大陸委員會、中央研究院等，並且很有體系地進行著研究。

韓國最初的中國研究的專門研究所，是 1974 年設立的漢陽大學中蘇研究所。隨後檀國大學、啓明大學、成均館大學、國民大學等陸續設立了有關中國研究的專門研究機構。

表 1 韓國大學有關中國研究機構現況

大 學	研究所名稱	設立年度	學術雜誌名稱	研究領域（範圍）
漢 陽 大 學	中蘇研究所	1974	中蘇研究	政治、外交、經濟、社會
檀 國 大 學	中國研究所	1977	中國研究	政治、經濟、文化、軍事
啓 明 大 學	中國學研究所	1979	中國學志	政治、經濟、社會、歷史
國 民 大 學	中國問題研究所	1982	中國學論總	政治、經濟、教育
成均館大學	現代中國研究所	1989	現代中國研究	政治、經濟、社會
建 國 大 學	中國問題研究所	1981	中國研究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上述的大學研究所，雖然均以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為目的設立，但實際上，除漢陽大學的中蘇研究所（現在改名為亞太地區研究所）之外，其他研究活動都並不活躍。進入 90 年代以後，除上述研究機構以外，首爾（漢城）大學的社會科學研究所、西江大學的東亞研究所、延世大學的東西研究所、慶南大學的遠東問題研究所等也開始積極進行有關中國的研究。

中國的改革開放，韓中外交關係的建立以及韓國國內學術自由度的擴大，使中國研究從 90 年代開始迎來了新的轉折期。韓國國內培養出越來越多的中國研究人員，加上從英美和台灣地區學成歸國的研究人員，韓國的中國研究開始充滿活力。可以說，90 年代是中國研究能夠作為地域研究學的一部分，

在韓國學術界具備有利環境和條件的時期。

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和韓中兩國交流的擴大，中國社會越來越引起韓國社會的關注，中國研究也有了持續的發展。尤其在 90 年代中期，在全球化的時代潮流中，在地域研究的研究機關和學術團體日益增多的同時，高等院校中中國研究專業和專門研究中國的研究生院的設立，也為韓國持續培養中國研究人員和不斷推出研究成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 1997 年開始，韓國教育部屬下的學術振興財團開始隆重開展海外地域研究事業。尤其自 2002 年以來，為從事中國研究的研究人員提供更多的機會和研究經費，極大地鼓勵了中國研究事業。2002 年至 2005 年間，許多中國研究項目被選定為學術資助

項目。2004 年，總共有 305 個地域研究項目入選，資助經費達到 680 億韓元。2005 年也有 670 億韓元用來資助地域研究項目。而在 134 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中，有 9 個項目是有關中國的研究項目。受到研究經費資助而進行的中國研究成果一般以單行本的形式成書出版，為更多的中國研究學者提供了很多的信息和研究資料，中國研究的主題從此更加豐富多彩。此外，韓國統一部、外交部、外交安保研究院等也為從事中國研究的研究人員提供了研究經費。

隨著中國研究的領域與課題逐漸增加，中國研究學者除頻繁地去中國調查第一手資料外，通過網路也更加容易接觸和查詢更多更新的中國資料。目前韓國的中國研究愈來愈充滿生機和活力。

總之，從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由於冷戰體系的瓦解和韓中外交關係的建立，韓國的中國研究不再是關於共產主義國家的研究，而是逐步發展為地域研究學的一部分，從而真正被賦予了學術和實踐兩方面的價值。

(二) 研究隊伍

90 年代韓中建交以來，韓國的中國研究人員總數愈來愈多。所謂中國研究人員，雖沒有一定的基準，但一般認為，以中國問題為博士學位論文選題的博士畢業生，取得學位之後繼續研究中國問題，且在學術雜誌不斷發表有關中國的論文的研究人員，才被稱之為中國問題研究人員。

至於研究者總數，應分為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個部分探討。因為目前尚不存在能夠包容所有中國問題研究人員的任何學術團體。在人文科學方面，以語文學、歷史學、哲學為研究中心的韓國中國學會，其歷史最悠久，會員人數也最多。到 2006 年 1 月為止，會員總數達 1,300 多名，分文學、歷史、哲學三個領域進行研究和交流活動。在社會

科學方面，1994 年創立的現代中國學會最具普遍性與代表性，通過此學會掌握的中國問題研究人員情況，截至 2005 年 7 月，會員總數為 236 名。

根據韓國國際政治學會發表的學會新聞，到 1999 年末為止，中國政治問題的專門研究人員為 89 名。從韓國國際政治學會和中國政治研究會的研究者通訊錄以及現代中國學會的通訊錄獲悉，2005 年中國政治問題研究人員總數大約為 124 名。中國政治研究會，是韓國的中國政治問題研究者的學術團體，是從 2001 年開始設立的組織，現有 51 名研究人員。他們一般是在 90 年代初至 2005 年這一期間取得博士學位，絕大多數年齡在 30 歲到 40 多歲之間。這 51 名研究人員的博士學位取得國家和地區分別是：英美國家 5 名，韓國國內 2 名，中國台灣 2 名，中國大陸 20 名。可見，國內的本土博士明顯減少，而在中國留學獲得學位的博士占了很大比重。

研究人員的數量增多，可看做是中國問題研究愈來愈活躍的證據之一。過去，對研究人員的博士學位取得國家特別重視，因為取得學位的國家不同，其研究主題、研究方法或對中國的認識都有所差異。這儘管有一定的道理，但最近幾年，博士學位取得國家不再是重要的因素，而研究領域是國內政治還是對外關係，研究視野是宏觀研究還是微觀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因為這些才是其研究方式與資料的決定因素。

(三) 研究成果

除研究環境、研究人員之外，能夠說明研究現況的另一重要的部分，就是研究成果。韓國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成果可分為學術專著、學術期刊論文和博士學位論文三個部分。從 1991 年到 2005 年間，中國研究的研究成果資料如表 2 所示。

表 2 韓國的中國研究的成果

年	度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學術專著 (部)	歷史	209	272	362
	語言 / 文學	108	123	177
	哲學	95	105	109
	藝術	36	48	90
	社會	45	67	117
	政治(外交) / 行政	226	320	356
	經濟	369	444	611
博士學位論文 (篇)	歷史	36	48	37
	語言 / 文學	56	73	81
	哲學	32	37	32
	藝術	8	27	55
	社會	4	3	1
	政治(外交) / 行政	52	54	57
	經濟	35	60	78
學術期刊論文 (篇)	歷史	330	617	748
	語言 / 文學	607	1,397	1,755
	哲學	195	351	428
	藝術	145	222	345
	社會	307	461	707
	政治(外交) / 行政	1,145	1,729	1,788
	經濟	1,189	1,636	3,271

學術專著的總數，從 1991 年至 1995 年間共出版 1,088 部，從 1996 年到 2000 年間為 1,255 部，從 2001 年到 2005 年間為 1,567 部，顯示數量方面的持續快速增長趨勢，其中，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書籍各占 50%。人文科學方面，歷史領域的研究成果占的比重最多；社會科學方面，經濟商業領域的研究成果最多，其次為政治領域。

博士論文的總數，1991 年到 1995 年間為 223 篇，1996 年到 2000 年為 302 篇，2001 年到 2005 年為 443 篇，同樣顯示不斷持續增加的趨勢。其中，語文學方面的學位論文最多。在社會科學方面，從 1996 年開始，

有關經濟和商業的博士論文超過有關政治問題的博士論文總數。與學術專著不同，博士學位論文人文科學方面的比重多於社會科學方面。

學術期刊上刊登的中國研究論文總數，1991 年到 1995 年期間為 3,918 篇，1996 年到 2000 年期間為 6,413 篇，2001 年到 2005 年期間為 9,042 篇，顯示每年不斷增加。

研究領域中，社會科學領域的成果最多。2001 年開始有關經濟問題的論文呈快速增多趨勢。這是由於近年來韓中兩國間的經濟政治交流日益活躍，有關中國經濟和政治問題的研究也就日益充滿活力，發揮著主

導作用。

學術期刊一般分各個研究領域，均有刊登中國地域研究的論文。目前期刊名稱冠有“中國”二字的學術期刊就有 50 多部。

韓國的研究中國問題人員的論文，在 70～80 年代僅依據英、美、日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利用的是第二手資料，以停留在整理有關資料水平的論文為多。而自 90 年代開始，中國實地調查與方法論的分析能力相結合，以第一手資料為中心進行分析的研究愈來愈多。尤其是在韓中建交以後，隨著韓中兩國交流的激增，在韓國，對中國的再認識成為現實迫切需要的研究領域。

(四) 相關的政治學研究主題

90 年代以後的中國政治研究，在資料和選題方面都有了數量與質量的飛躍發展。除了文獻調查，還有問卷調查、訪問調查，以及利用中國國內資料等。開始從“查獲資料”階段進入“分析資料”階段，研究主題方面的微觀分析占的比重也愈來愈多。

這一時期，韓國的中國政治學研究的主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於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研究

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在於經濟的市場化、分析化與私有化。因此，很多韓國學者，以中國的中央政府實行的分權化政策為中心，研究中國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以廣東市與上海市為對象研究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中央的對沿海地區優待政策、地方保護主義等，都是研究者們關注的主題。

一般認為，由於中國的中央政府掌握著地方的一級黨政領導人事權，因此，像中國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僅限在經濟方面，而未影響到政治方面。

第二、關於中國基層政權的研究。

以前中國研究的主流，是關於中央政策或關於省級單位的地方政府的研究。相對

地，關於改革開放後的地方基層單位的研究就為數不多。因此，未能深入分析中國經濟改革中最重要變數問題，也未能關注地方基層單位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靈活性。

最近十年間，從過去的研究（即關於中央政府政策或關於省級單位的地方政府的研究）中擺脫出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地方基層單位和組織。尤為活躍的是關於鄉鎮企業與鄉鎮政府關係的研究、對地方政府在鄉鎮企業發展過程中起的作用的研究以及對村民委員會主任選舉過程的研究等等。有關鄉鎮企業的研究中，特別受到關注的研究對象是中國鄉鎮企業發展的典範——蘇南和溫州地區。

關於地方政府與鄉鎮企業關係的研究，由於所有權改革，發生了很多的變心，以前的研究有很多問題是無法解釋的。比如，集體企業發展較快的蘇南和山東沿海地區的鄉鎮企業，2000 年以後，大多數企業或者改為股份制，或者改為私營企業。過去議論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問題，不再是值得重視的議題。這同時也是政府與企業關係變化的決定因素。

第三、關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

1989 年以後，美國對中國的研究開始流行“國家——社會”模式，韓國的中國研究則開始了關於中國市民社會形成的可能性的研究。特別是在經濟領域，“私營企業家集團”，由於它不受國家直接統制的約束，可以自由開展經濟活動的緣故，成為此類研究的主要對象。此外，2000 年以後，有關工會或非政府組織的討論也比較活躍。

第四、關於社會分化的研究。

由於改革開放政策出現的個人之間、地方之間收入差異，階層分化現象、新的社會集團的出現等等，都開始引人注目。韓國的中國研究中，對工人與企業家的關係的研

究，關於農民工與戶口制度的研究，關於地方收入差異的研究越來越多。

有些學者開始進行對中國中間階層的研究，令人矚目。他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隨著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中國社會的階級、階層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是由工人、農民、黨政官員以及知識分子組成的較為單純的階級階層社會，而由於經濟改革，有愈來愈多的企業形式出現，社會整個經濟環境發生急劇變化，在當今中國社會形成了現代社會的所謂中間階層（中產層）。

此外，有些研究揭示了改革後中國勞動市場環境變化的本質，闡釋了通過這樣的環境變化新登場的社會和地域間的不平等結構。

最近的研究，則開始關注中國政府為解決地域差異，立足於“均富論”所推行的西部大開發，並進行系統的分析。

第五、關於中國的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的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一般是關於中國外交政策的目標、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中俄關係的研究。中韓建交以後，有很多論文是關於中韓關係的研究，也有一些是關於兩岸關係的研究。

總之，90年代以後韓國的中國研究，其研究分析的範圍從中央轉移到地方，其研究主題日益呈現多元化。因此，可以說90年代以後，是韓國的中國研究在質和量兩方面都發展和成長的時間。

三、中國研究存在的問題

30多年來韓國對中國研究的現況如上所述。總的來說，韓國的中國研究自90年代開始，在研究隊伍與研究成果方面有了比較大的發展，研究論文的總體數量和質量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也並不少。

第一、由於學界之間的交流未能有效進行，因此，韓國的中國研究，儘管是地域研究的一部分，但尚未實踐地域研究學角度的從個體到整體的接近。而且，在學術方面，中國研究與政治學又有比較大的差別，不宜套用政治學的方法論分析和探討其問題，將中國研究簡單歸類到政治學的一部分也不大恰當。因此，中國研究的學術傾向不易把握，很容易被視為單獨孤立的研究領域。進行地域研究，需要對所研究地域的語言、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都有所了解，才有可能做到全面和深入。地域研究作為一種學問能否被認可，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學術領域的問題，在中國研究中也同樣存在。

長遠來看，關於中國政治的研究，其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在政治學領域，中國政治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韓國的中國政治研究，以後將在社會科學體系研究方面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第二、由於研究方法上缺乏多樣化，且爭論的課題不確定，中國研究的理論水平目前還相當低。當前韓國的中國研究，相對於其他地域研究，是令人矚目的，因為關於中國的研究，是當今韓國社會和國家需求量最多的領域。現在，應該說是中國政治研究發展最重要的時期。因此，應該把握時代的機遇，使地域研究在韓國國內打下堅實基礎。

目前韓國國內擁有很多留學自英美、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中國問題研究人才和專家，需要他們共同進行研究與討論，開發韓國獨有的研究方法和理論。

第三、制度條件的不充分和研究氛圍的問題。很多中國研究專家認為，學術會議未能充分發展其作用。學術會議上，學者之間應進行真摯對話和批判討論，才能夠擴大學者個人的思考能力，但實際上，很多學術會議只停留在形式上的提問和討論上。因此，

需要學術會議開發更多有爭論意義的主題，發掘其學術價值。每位研究者的研究過程與研究成果在學術會議都能被討論和鑒定，從而提高個人的研究水準。

四、中國研究的未來發展構想

第一、為促進中國研究的活力和開發新的研究領域，可組織小規模的研究小組。韓國的中國研究，儘管其研究人員數量不斷增加，學術期刊發表的有關論文總數愈來愈多，但現在的中國研究都還是個人的研究。因此，研究主題常常有重覆現象，且研究成果也不夠深入。成立研究小組，可以共同討論所研究的主題，可以開發和交流新的方法，也可以與其他專業的研究學者進行跨學科的交流。這樣既可以打破學問和專業的界限，促進相互交流經驗，取長補短。同時也將是解決大規模學術會議固有缺點的一個實際方法。

第二、中國研究不能僅停留在積累知識的水準，而應該積極摸索能夠為社會做出貢獻的方法。這與中國研究的社會實踐意義有關。這並不是說中國研究只是實用主義的學問，而應考慮中國社會的政治社會變化對韓國的影響。學問本身雖有自我價值，但更重要的是，能夠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中國地域研究，不能排除政策研究。因為不論是對哪個國家的研究，若不能滿足時代和國家的社會需求，都將面臨危機，這與學術界的評價是無關的。

第三、推進成立專門的中國研究資料室或有關中國研究的綜合資料中心。這樣做既是為了學問的大眾化，也可為後來者提供相關資料和信息，而且，這樣做也為諸多學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機會和研究環境，能夠提高他們的積極性，因此是十分有意義的。

第四、需要與中國學者共同研究。

根據中國研究的現況，努力提高研究質

量。在研究方式上，應加強對具體地區的實地調查和訪問。應努力提高研究的完成水平，而不是停留在形式上的研究工作。與中國當地的研究學者的交流和共同研究會取得連鎖效應，也會取得滿意的研究成果。這種共同研究，在提高中國學研究整體水準上，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這樣既可克服個人研究的缺陷，也會不斷開拓新的研究思路。

韓國的中國研究學者們的相對優勢之一就是，韓國也是一個屬於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因此，若是通過消化龐大的中國文獻資料進行研究，韓國的學者比西歐學者占優勢。

此外，中國學者的局限性有時表現為不能客觀地對待本國問題，西歐學者理解與之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國也有很大困難，而韓國學者既熟悉西方的理論體系，又對中國文化不感到陌生，能夠站在中國學者和西歐學者的中間，看到他們二者都看不到的問題和現象。

韓國的中國研究學者們，應通過相互合作，得到成倍的研究成果，而非相互競爭帶來的負面效應。應重視和利用集體的文化基礎，通過“分工”與“合作”，建立學者之間的研究構架。

綜上所述，90年代以後，韓國的中國學研究，在質量和數量方面都有了整體水平的提高。但在研究方法和資料運用方面，仍存在很多不足之處。因此，今後的研究課題，應在批判性地接受美國日本等外國的研究領域和方法的同時，有必要開發韓國能占優勢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韓國的中國學研究，儘管尚存在不少不足之處，但前景還是十分樂觀的。韓國的中國研究人才豐富，研究的主題和領域龐大。只要研究者們把握機會，互相勉勵，努力溝通和交流，將學問和實踐相結合，韓國的中國學研究，其發展前景是光明的。

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與共同體理論

祁建民 / 日本長崎西博爾德大學副教授

戰後日本中國研究中的“共同體”理論，伴隨著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深化，對於“共同體”概念本身所包含的意義也開始了新的開拓，因為“共同體”理論畢竟是揭示出了人類社會中所不可或缺的相互合作與關係的側面，特別在中國社會以及倫理中強調人與人的關係是一個明顯的特點。這樣從 60 年代起日本的“共同體”概念在經過戰後大塚久雄的重新定義之後又發生了新的流變。這時對“共同體”概念進行重新詮釋的首先是京都學派的谷川道雄。經歷過六 60 年代安保鬥爭的谷川，對於以往的民眾史研究產生疑問，在總結中國史研究中的共同體問題時，谷川批判了把共同體歸結為“落後或殘餘”的觀點，對共同體進行重新認識。

進入在 80 年代以後，雖然日本的中國古代史學界對於共同體的討論已為鄉紳論或地域社會論所代替，但是，在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中，對於中國農村社會共同體的研究卻開始興盛。這時

所使用的資料並不僅僅是歷史文獻，而是通過田野調查所獲得的資料，這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戰爭期間滿鐵等調查機關在占領區進行的農村實態調查所得到的資料，另一方面是比較年輕的學者通過自己親身到中國農村進行實地調查所獲得的資料。所以，就資料方面來說，他們比戰後初期僅僅利用滿鐵等戰時調查資料的研究者也有優勢，特別是在研究方法上，對於“共同體”的研究還吸收了社會學有關社區和地域社會的理論。在價值取向上，對於“共同體”所表示的人與人的社會結合關係由消極的否定變為積極的肯定。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與這時研究者們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學術潮流分不開的。

在國際學術潮流上，自 80 年代以來，無論是歐美，還是日本的思想界開始脫離 19 世紀以來的把個人獨立、追求自由放在首位，排斥共同體的價值取向，而是重新認識到人們相互聯繫、共同合作的意義。作為近代

市民社會學問的社會學在“個人”和“社會”的關係問題下經歷了 100 年以上的爭論後，開始發生轉變。在 19 世紀，共同體是作為一個被消失的東西而發現的，它是以人格的親密以及同相互扶助相關的道德、情緒等紐帶等綜合關係為基礎所構成的凝結體。但是，很長期間內人們都把共同體認為是市民社會的對立面。人們一般是將“個人的自由”與“共同體的規範”對立起來，多數的場合是二者必居其一，將個人的自由作為公理，而排斥共同體的道德規範與理念。而從這時開始，規範過頭的自由、恢復社會的秩序，成為現代人們所必須考慮的課題，社會學研究的中心轉變為如何構築個人與公共的協和。在後現代主義的人類學中也出現根據人們的認同而形成“親密圈”、“公共圈”等概念，對共同體這種人的結合關係也出現新的評價。

一、共同體概念的流變

谷川道雄對於“共同

體”概念的重新定義，標誌著戰後日本“共同體”理論發生根本變化的開始。他認為共同體是私有制和共有制、階級制和共同體這樣的矛盾統一體，人類普遍存在的形態就表現在共同體之中。作為人類生活場所的社會，不是僅僅由私有制、階級制這樣的對立的側面構成的，而是與共有制、共同制這種合作的側面雙方共同構成的。不是由於生產關係的矛盾產生階級鬥爭，而是在私有制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共同性和人性的異化（孤獨化），這樣被異化（孤獨化）了的人們便又重新開始向“共同體再生”的方面實行復歸，這就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

谷川結合自己研究的魏晉南北朝史說：“在私有制已經確立的歷史階段中的共同體作為其機能恰恰是具有阻止或者是克服私有制的意義，作為這種意志的代言人或人格體現者可以認為是貴族即豪族的存在。”在中國歷史上，產生農民起義的原因是由於共同體這種人們的生活場所被一種壓力破壞，而新王朝的誕生標誌著共同體再生的趨勢。例如，從北魏末期城民起義中可以看到，北族曾經是支撐北魏王朝的中堅力量，但是在王朝發展過程中，他們被從統治

集團中排斥，為此而開展了共同體的再建活動，隋唐帝國的形成本就是這一原理。在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間的共同體是由自由的小農和被稱作“士大夫”的領導者構成的。這種“士大夫”是能夠抑制和超越世俗慾望、以公共世界為取向、有倫理色彩的人物，他們是信奉儒教的知識人。谷川把這種以倫理意識為媒介構成的共同體叫做“豪族共同體”。這是超越了過去以血緣為紐帶結成的共同體，是共同體從古代向中世紀的發展。魏晉南北朝的貴族就是以這種共同體為基礎形成的。另一位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川勝義雄也認為中世貴族的來源是按照經濟和武力來說顯示出領主化傾向的豪族以及與之相聯合的與中央官宦對立的知識人群體。

對於中國歷史上共同體的演變過程，谷川按照自己設定的“共同體”概念是這樣總結的：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動破壞了作為殷周國家基礎的氏族共同體，因此，沒有產生出廣泛的奴隸制生產方式，在那裡較多出現的是比較小規模的以家族方式生活的自營農民，形成了被稱為“里”那樣的集落。在這些，當“里民”們從事祭祀、防亂、生產等活動時，所結合成的相互合作

關係就是“里共同體”。其領導者是當時被稱為父老的具有豐富經驗的長老。從領導體制來說，“里共同體”中存在著濃厚的血緣的或者虛擬血緣關係。“里共同體”已經不是氏族共同體，其間出現家族分立、土地私有。這樣奴婢、佃戶等陷入貧困的人逐漸增加。在漢代四百年間，這種分化日益加劇，形成豪族也就是大土地所有者和喪失土地者的兩極分化。這就是作為公共權力的漢王朝衰弱的根本原因。在此之後，豪族即大土地所有者與隸屬民之間個人間的結合成為社會經濟中的主要傾向，由此產生了六朝貴族制社會。六朝貴族制社會進一步強化，出現了隋唐統一帝國，也就是貴族的官僚化越來越被強調，大土地所有制被納入到均田制這樣的國家體制之中。但是，在六朝、隋唐社會中，大土地所有者自己沒有能夠形成作為政治體制的領主制，這樣就存在著沒有被領主制所吸收的大量的自耕農。那麼，這些自營農民的社會秩序是否與作為秦漢帝國基礎構造的“里共同體”完全一致呢？谷川認為，在六朝時期，秦漢時代的父老層指導體制已經看不到，作為其基礎的三老制度也無影無蹤，代替他們的是豪族階層的出現。正是豪

族階層成爲廣泛存在的自營農民的領導核心。本來大土地所有者與自營農民是互相對立的，因爲兩極分化達到極限便使社會秩序遭到破壞，漢王朝的覆滅即是證明。但是，在六朝時期，吸取漢代的教訓，出現了知識分子和民眾兩方面都對無限擴大土地占有的行爲進行限制的輿論和運動，豪族的領主化傾向被阻止。這樣，豪族自身並不是無限擴大其土地所有，而是自行限制，將資產的剩餘部分用於救濟，以此來築固其社會地位。這種抑制私利重視公益的倫理觀念與儒家的道德理念和道家的無私思想相結合，成爲日常生活的實踐。這樣，豪族階層對於民眾的領導不是依據土地所有形式下的直接的統治，而是轉而發揮其精神性的影響。當時對於社會領導階層的這種倫理上的要求，就是鄉論。鄉論在六朝時代與官吏登用制度結合，成爲了九品官人法的一環。所以豪族制度的基礎是“豪族共同體”這種民眾支配構造。“里共同體”是以虛擬血緣關係爲紐帶，而“豪族共同體”的結合契機則是生活倫理，這可以看做是中國歷史從古代向中世的發展變化。

不過，谷川的共同體論受到重田德的批判。重田說

谷川把共同體優先於階級關係，僅僅強調共同體的平衡恢復機能，他們所說的共同體不是以自然的物質爲基礎的，而是按照所說的心情的意識的結合而形成的，“幾乎都是在民眾範圍的狀況發生的人們的平等的願望、希求等等”，這就脫離了從來的經濟史上被定義的共同體概念。這種共同體是主觀的、觀念的、倫理性的。並且，重田認爲從唐代以前屬於奴隸制的觀點出發在大土地所有制發達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由貴族和自立小農結合構成了共同體的觀點也是值得懷疑的。對於重田的批評，葭森健介認爲，重田的觀點是固守把共同體從生產關係的觀點一元化的理解，歷史發展的動力就是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把共同體作爲一種社會結構來認識。而谷川是對以往唯物史觀機械的理解產生疑問，他們是從政治社會史研究中形成了共同體論，這種共同體不是一種靜態的東西，而是歷史發展的機制中的一種志向。谷川對於重田的批評是這樣反駁的：“實際上六朝時代是已經體驗過漢代以來競爭、兼并的社會，深切感受到這種事態所帶來的深刻的政治分裂、流離和貧困，基於這樣的歷史感覺形成了豪族共同體，這是把維持獨立小農

爲主的社會作爲使命。在這裡我強調了‘倫理性’或者‘精神性’，也就是說這是歷史沉重體驗的產物。”

“這樣看來，可以很容易理解爲所謂的‘倫理性’或者‘精神性’的東西實際上正是再生產構造所不可缺少的主體條件。”

在重田與谷川等的爭論發生之後，又有五井直弘、多田狷介、堀敏一、田中正俊等史學家加入討論。這時討論的重點是如何確認“士大夫”倫理性的領導在維持共同體再生中的作用，也就是對於“士大夫”倫理性領導的解釋，分析共同體內部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他們一般認爲依靠‘士大夫’倫理性領導而維持的共同體是在當時低水平的生產力條件下產生的，“士大夫”的倫理行爲使統治階級作爲共同體的首長而對共同體實行掠奪。此後的研究向著“士大夫”的倫理性經濟活動（例如賑卹活動）與共同體維持機能關係方面發展，肯定了“士大夫”維持共同體機能的存在。這種研究趨勢的發展最終導致出日本關於中國鄉紳論和地域研究的方法。對於中國“共同體”的另一種新探討是仁井田陞提出了共同體是宋代以後再生的產物。他說，中國自古以來一般村落中“共同體”性

質的土地所有關係十分稀少，農民們保障其再生產的機構是宋代以後出現的同族共同體。出現了像義庄那樣的同族所有，其收獲用於同族互濟。在這裡，大地主救濟村中的貧困者，以此來抵消反抗的力量，穩定封建秩序，使村落秩序得以安定。所以，這既是大地主貫徹其統治的一種新手段，也是一種滿足同族利己主義的方法。鄉約等也是由支配者實行的村落自治的姿態。在那裡雖然有伙伴間的利己主義，但是即使稱為伙伴，也是由有實力的人來支配，看不到平等的原則。中國社會存在著這種血緣、地緣的以及基爾特和宗教的多樣的人的結合。

60年代初現的中國“共同體”概念的變化，已經超出戰前和戰後初期“共同體”所表示的社會形態或者階級關係的內涵，具有了時代性和空間範圍的意義，這就為此後把“共同體”主義引入到近現代史和地域社會研究提供了條件。

二、共同關係論與共同體研究的再興

在日本 70 年代以後一個時期裡，學術界對於日本社會的“共同體”、“ムラ（村落）”、“集落”等進行了非常廣泛和深入的討

論。這時的討論首先是批判了 50 年代大塚久雄的近代主義的共同體價值觀，把村落中“共同體”那樣的強固的人的結合，看作是對於人們生活和生產具有積極意義的東西而加以肯定。這時的“共同體”成為農村開發運動以及其政策理念的理論基礎。這樣，“共同體”作為馬克思理論關於生產方式的概念便轉變成為社會學上關於社區或地域集團的概念。其研究目的也從對於日本社會全體的改造變成為狹義的對於農村社會的認識手段，最主要變化就是對於“共同體”由價值否定轉變為價值肯定。

正如北原淳所指出的，在 70 年代以前，“共同體”具有特殊的意義。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在經濟史和歷史學界，把“共同體”認為具有物質基礎，具有土地的共同所有和共同管理，是遠古時代延續下來，在私有社會殘存。但是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並不是經過實證的理論，而是表現一種理念的意識形態。現在所說得共同體，不局限於土地所有，是基於某種共同的成員意識而進行的種種共同行為，是指比較狹小範圍的村落組織或地域社會。

80 年代以來對於中國近現代史中“共同體”問題

的研究，就其學術源流來說，是從戰爭期間開始的農村調查研究。曾經參加過華北農村慣行調查，專門負責村落組織分課題的旗田巍在戰後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成果。70 年代出版的『中國村落と共同體』一書對日本學界影響很大。旗田巍根據其親身對華北農村調查的經驗，認為中國並不存在大塚久雄所主張的那種在日本和歐洲所見到的“共同體”，在中國是一種特殊的共同體，它的特證是在以奴隸制統治為內容的家父長制的家族中，其共同關係會成為階級統治的支柱。

作為年輕一代的學者，自 80 年代以來一直孜孜以求，用“農村共同體”理論研究中國農村的當屬內山雅生。內山認為，關於市民社會的成立使得共同解體的理論是按照歐洲社會歷史總結出來的，馬克思晚年提出“亞細亞式的共同體”概念之後，一直沒有新的進展。內山企圖通過對 20 世紀華北農村社會的研究，來探明“共同體”性質的具體的社會關係在農村中是如何變遷的，它的真實情況又是什麼等問題。內山提出，應該把“共同體”看作歷史的產物，它即具有支撐王朝統治的體制維持機能，又具有在打破王朝統治的農民鬥爭和

秘密結社中所看到的那種體制批判機能，這兩方面是同時並存的。特別是他把“共同體”問題與中國革命運動聯繫起來予以解釋，不能不說是一大創新。內山根據對40年代“平野—戒能”爭論和旗田巍有關的研究，認為在中國農村並不存在與西歐、日本性質相同的“村落共同體”。所以在他的研究中為了避免誤解，更多地使用了“共同關係”一詞，它是一種可以被稱為“共同體式的諸關係”的社會關係。內山對於華北農村“共同關係”的研究是從對華北農村中廣泛存在的“看青”、“打更”和“搭套”、“合具”等社會行爲的進行極為精密細緻的分析著手的。

對於中國農村的“共同關係”，內山認為不能像大塚久雄那樣要判定它是不是“前近代”的，而是認為其本身在中國社會即使是“非歐洲近代式的”，那也是先進的，它是與中國獨特的近代要因緊密聯繫的。內山還說，可以預測，在多重社會體制轉換過程中磨練出來的中國農民的頑強性格和他們所堅持的相互間的結合或團結的習慣行爲，或許是正向市場經濟邁進的中國農村發展的支柱。

這一時期用新的資料和方法研究中國現代共同體問

題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石田浩，他的論點核心是強調村落的作用，並提出了“生活共同體”的概念。在戰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裡，日本學界對於中國農村研究的中心課題就是否認“村落共同體”的存在，代替這種理論的是“農村社會市場論”。認為中國農村的結構是以集市或鎮為中心，通過其覆蓋的商品流通網絡形成包括附近村落的市場圈，這個封閉的市場圈就是構成農村社會的基本單位。

石田浩明確指出，認識中國農村社會的關鍵並不是“農村市場社會說”，而是村落。在中國的村落中，缺乏作為“村落共同體”物質基礎的共同體的土地所有，也看不到強制耕地等共同體的規則，所以，從這一點來說，也同意不存在“村落共同體”的觀點。但是，即使說解放前農村日常生活中農民的行政跨越出村落，直接到達市場圈，但是在這中間依然存在著幾個不同的社會經濟的網絡，其最小的單位依然是村落。在村落中，作為代替“村落共同體”物質基礎即共同體土地所有的是人和人之間的網路、也就是人的結合。正是由此來保障農業的再生產和村民生活的再生產的。石田將這種人的結合網絡稱為“生活共同

體”。這種“生活共同體”在村民之間的農業生產相互協助中，例如換工、水利上的共同排灌、金融互助、看青、村落防衛、婚葬幫忙以及村廟祭祀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生活共同體”雖然缺乏共同體的土地所有這種物質基礎，但是依靠“同族”、“同鄉”這樣的人的結合構成和維持了村民社會生活的集團性。“生活共同體”中人的結合基本上在村落範圍內結成的，本村人與外村人有明確區別，只有本村人才能得到恩惠。另外，中國村落雖然沒有境界或者境界不明確，但可以是按照本村人與外村人的區別來確認村落的劃分。

與內山、石田等關心和強調中國農村共同性方面的研究相對立，足立啓二則重視和強調其非團體性的方面。足立是從中日比較的角度立論的，他提出，把亞洲社會全部認為是具有封閉集團性特徵的社會，這種誤解長期流傳。但是，這絕不是亞洲社會的一般特徵，只可以說是在亞洲罕見的典型的日本社會的構造。在日本的村落中由特定的家族集團構成了固定的領導集團，由家族的代表組成村落全體集會這樣的決議機關，由這個機關選出的村方三役是其執行機構，村落具有極強的自律

性。與此相對，中國村落這種自律性的指標並不存在。與村民的土地總和不同的固定的空間範圍不存在，根據住區劃分的農家間的歸屬關係也不明確。一般沒有村落全體的集會，缺乏村落的公共事務與財產。作為村民沒有特別的優惠，村民與在村內居住的來自其他村落的住民沒有大的區別。同樣，村落這樣缺乏團體性的特徵在其他社會集團性上也有表現，在家族關係上表現為以父系血緣關係結成宗族，實行徹底的男子均分繼承制度，家族構成只是一個時期的、不安定的集團。在同業組織中也沒有日本那樣的由座和株仲間這樣掌握固定成員權的營業壟斷團體，而是由幾個有力者發起，其他人附和形成的任意的、自發的集團。在中國由國家權力對社會進行組織，進一步阻止了自律團體的發展，作為中間團體的領主制始終未能形成，使得專制國家得以長期延續。

內山和石田的研究與足立啓二等人的研究是本來是互相平行的，各自揭示了中國社會的一個側面，沒有直接發生爭論。不過，由於奧村哲針對兩種對立的觀點進行評論，引發了兩種觀點的交鋒。奧村是支持足立啓二的觀點的，對於內山和石田

的研究、奧村哲提出批評。奧村總結說，對於與中國共產黨相關的解放前農村社會的認識方法，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觀點，即追尋“共同體”性質的觀點和與之相反即強調其共同性低下的觀點。對於石田和內山二人將解放前的農村看作是“共同體”性質的社會關係，並且這種關係在社會主義體制下也依然殘存的觀點奧村表示“無法同意”。他認為，當年圍繞“共同體”問題，平野與戒能的爭論早已由旗田巍、村松祐次、福武直等人的研究做出明確結論。石田的生活共同體論依據的是馬克思的觀點，其實那種觀點根據小谷汪之的研究已經證明那並不是按照亞洲的實際情況得出的。

對於奧村的批評，內山進行了反駁，與谷川道雄在進行共同體爭論時所採取的方法一樣，內山也是首先就共同的概念加以重新界定。內山說，奧村與他在關於共同體的認識上，存在著觀念上的根本不同，奧村的觀點大大脫離了近年圍繞共同體的研究。因為奧村依然是從與“近代”相對立的“共同體”的角度來認識。內山援引了北原淳的這樣一段話，“‘共同體’的意義廣泛，是相當於英語 community 意義的地域集團、地域社會，

是把社會學固有的‘社區’概念也附加到‘共同體’上。”（北原淳『共同體の思想—村落開發理論の比較社會學—』）內山強調，他所提出“看青”、“打更”、“搭套”、“合具”等傳統農業習慣行為，本來是農家在個體經營中為了維持生產和生活而形成的以“共同性”為核心的共同生活空間，這些原來的習慣行為在集體化時是作為接受裝置而存在的。針對三品的批評，內山認為在中國農村中農民以“地域的公共性為前提的共同性”這種社會意識是存在的。

對於共同性與個人主義兩種觀點的對立，近年還有人進行新的探討。例如，深尾葉子和安富步通過對陝西農村中“相伙”（相互幫忙的方式）與“雇”（金錢支付的方式）的田野調查與理論分析後認為，這兩種各具有“共同體”性質和“個人社會”性質相對立的勞動交換關係在同一村落是同時存在的。村民們是以人際關係的遠近為基礎，加上村落內“傳聞”因素的影響，決定了他們之間的勞動交換是用“金錢支付”還是用“相互幫助”的形式。他們試圖將共同體觀點與個人主義的觀點用動態分析的方法統一起來認識。岸本美緒認為中國

的中間團體乍一看呈現出多種現象。作為一種防衛性的非制度的相互扶助團體，在危急的時刻可以呈現出內藤湖南所關注的曾國藩義勇軍，有著令人驚嘆的紀律和內在的結合力。但是有時又不過是缺乏共同意識的散沙一般的惰性集團。在集團內部，在沒有固定的身份階層制的同時，保障成員間平等關係的規範也不存在。對於這樣的中間集團由於關注其不同的方面，因而對其的評價也就大相逕庭。

三、共同體概念變化與對中國認識的變化

戰後以來，從大塚久雄對於共同理論進行重新解釋，到谷川道雄對共同體認識進行革命性的變革，再到“共同體”的含義向社區或地域理論概念的轉換，這使得當代日本的“共同體”一詞念所包含的意義十分廣泛，甚至可以說是含混不清，每個學者都是按照自己所認定的“共同體”來分析、把握中國社會。正如柳沢和所指出的，戰後日本關於中國“共同體”概念發生變化的起因是對於“共同體”概念的規定十分含混不清，將“共同體”與“共同體”性質的東西不加區別地議論。

但是，總的趨勢是，研

究者們逐漸放棄了階級論的共同體，而更多地採用集團論的共同體，放棄歷史學和經濟學中的“共同體”理論而採納社會學的共同體學說。特別是對於共同體的價值和意義由否定到肯定，更是一個根本性的變化。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上一節所提到的人類社會變化的大背景和國際學術潮流的演變之外，就對於中國的研究來說，更主要的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所給日本學界帶來的巨大沖擊。正是由於當代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才可能從根本上沖刷掉近代以來根深蒂固的中國“停滯論”。近年日本的中國研究出現的一些嶄新的觀點，就與此相關。

以往的中國研究對於中國社會中濃厚的“共同體”性質的人際關係，研究者往往將其歸納為“非近代的”、“關係主義”、“人治社會”等，加以否定。但是，首藤明和指出，對於造成中國社會活力的人間關係優先主義應進行積極的評價。他認為，在中國農村中人際關係是豐富和多樣的，已經經歷了近代化的歐美和日本甚至中國人自身現在才剛剛開始認識到這種人間關係優先主義所隱藏著的效用。由此可以解讀中國現代

化的多種可能性。所以要把中國的這種關係社會作為另一種文明來認識。

佐佐木衛也提出，以往人們認為中國社會構造的特徵是與“近代官僚制”的構造格格不入的，把這種社會構造看作是推行近代化的阻力。但是，只要觀察一下現代中國就不會認為中國沒有走向近代化。中國社會的構造從某種角度看具備動態的構造。在傳統社會中，以集團為媒介，由開發和移動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在現代社會，也不得不考慮傳統的集團構造在現代化進程中成為導致人們行動和活力的形態。

以史學研究帶來相互理解

—訪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所長^①

中國的「日本」研究者訪問系列

邵軒磊^② / 訪談、撰稿

訪談時間：2007/8/20 下午 3:00~5:00

訪談地點：北京東廠胡同內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位於王府井大街的北端，故宮的東北側，一條名為「東廠胡同」的巷子中。步平所長說，這個地方本來是明代的特務機構「東廠」的所在地；也是民國初年，袁世凱爲了掌握南方勢力，而特別爲副總統黎元洪在北京常住所買的房子，之前據說是榮祿的宅第。在這裡研究近現代史，也許更感到時代的沈重與消逝吧。

問：也許先從所長近年主持的「東亞三國共同近現代史」這個工作開始談起，對這件事情有什麼「甘苦談」？

編列的時候，日本方也曾問我，爲什麼南京大屠殺是三十萬呢？三十萬有什麼證據嗎？這個問題爭論了很久，最後定稿是以東京裁判的「二十萬以上」和南京裁判的「三十萬以上」並列。此間甚至有南京的學者表示「不寫三十萬我就退出！」的立場，而且民間常有人以這個數字來質問我；反過來說，日本的學者引用了東京裁判的「二十萬以上」就已經受到社會壓力與右派攻擊了。此時我就扮演說服的角色，協調國內學者的情緒。但實際上真正的數字已經沒有辦法解決了，第一、時間過去太久；第二、當時並

沒有戶籍制度，而且長期征戰，人口本身就沒有辦法統計；第三、南京事件是一個很漫長的歷程，日軍從上海打過來之後有逃難的難民，有軍隊進駐，而之後也有逃離開的人，基本上是一團混亂。所以此時就只好採用兩次審判的數字，雖然這個數字也是很概括的，但是在更權威的研究出現以前，也沒有理由不用。這是一個協調的結果。

我們現在也把對話對象由左派拓展到中間派甚至中間偏右，當然這些對話並不很順利。我們也漸漸瞭解日本並不都是右翼，日本方面也能漸漸瞭解中國並不全部反日，如有的日本學者努力的向日本社會宣傳，讓日本社會瞭解中國學者也有中肯的研究，而我也常於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介紹日本社會與思想的現狀。目標不會是要對方投降，完全趨從於我方觀點。也就是，互相說明自己的歷史、立場與觀點上的基礎來討論。

問：既然是「東亞三國」，那麼在「研究小組」中，韓國學者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其實比一般人想的複雜，大家通常會以爲一定是中韓聯手對抗日本史觀。但實際上，由於韓國現在民族主義高昂，有的人既

批評日本，也批評中國。比如說批判中國的大國主義，從古代中韓關係，以中國的觀念來說就是「中央／藩屬關係」，也就是身份上有「高／低」關係，但並不是像「殖民／被殖民」關係一樣在實質利益上剝削，但是韓國人不能接受，認為近代中國與日本都侵略了韓國，就連袁世凱當初跟韓國的關係也算是侵略者。

問：其實「研究小組」雖然創造了個平臺，促進了國際瞭解，但是可能更多面對的是對國內「解釋」的問題。這樣一來就引申出，面對民族主義者的應對方式？

曾經我在演講時以近代史、中日關係為主題，本來看得出來有些民眾可能有一些意見，要來批評我的；但是我講完後他們沈默了，說：「從來不知道事情是這樣，今後必須重新思考。」我講了什麼呢？比如說日本遺留的化學武器問題，很多人直觀的覺得這件事情很不好，甚至罵日本人。但是真正去指出這些武器在哪裡？有多少？甚至在日本人不承認這件事時我還要與他們談判，在日本法庭上作證。最後獲得有利的判決，讓日本政府賠償，提供了技術與銷毀經費。恰恰都是我們研究日本的學者在做的事，這樣做才能讓事情解決，而不是糾纏在情緒裡頭。但是現在缺少這樣讓民間瞭解的管道，媒體反而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而博客（blog，部落格）在此雖然也具有某種效力，但是由於匿名性，實在無法具有回應的基礎。尤其是現在為了引起注目，網民經常挑選具有刺激性的言詞。基本上不是沒有辦法回應，但是我認為回應在網路上實在效率太低了。

問：那就延伸出一個作為背景的問題，為什麼中日關係從 80 年代的日本熱變成現在連學者也覺得不可擋的對日本憤怒的

心情？

這個問題在「東亞近現代史研究小組」中日方也提出來過，他們認為是中國政府打「歷史牌」，用「反日教育」來煽動民眾。可是反過來說在 2005 年的反日遊行時，中國政府並沒有煽動，反而極度壓抑而讓媒體盡量不報導；更何況中國現在的首要目標是面向國際，當然不會以採取這種姿態作為「政策」。「反日教育」的話應該跟 1960～70 年代教科書作為比較指標，那時不只在量上是現在的一倍以上，在質上也更多著墨於日本軍的殘忍與侵略；現在反而更多說日本在戰後的經濟成長等優點。

如果這兩者都不是的話，那關鍵是什麼呢？主要是 1980 年代中期，日本在經濟上成長，自然在國民自信上也增加許多。在 1985 年提出「戰後四十年總清算」，也就是說戰後日本經濟發達又對國際做出貢獻，可是還受到很多國家的批評，所以很不服氣。所以諸如東京審判、南京審判等等歷史，都必須加以再思考。所以就出現了「教科書、靖國參拜」兩個中日間主要的情感爭端事件，自此中日關係就走向了「72 年正常化」以來的轉折點。中方面臨日方這種「意圖翻案」的動作，就建立了很多「抗戰紀念館」，用以「提醒」社會，以我為例，當時在東北所研究的主要研究課題正是「東北淪陷史」。

90 年代中期就更深了，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社會面臨很大的集體焦慮。於是有人提出停止戰後五十年以來的「自虐史觀」，要多說光明面，也就是「新自由主義史觀」。意味著，不要接受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國際史觀」，也不要接受美國的「東京裁判史觀」；不靠向社會主義也不靠向帝國主義，而要真正「自由」的「新自由主義史觀」，這個詞是借用吉田茂的「自由主義路線」觀念，所以加上了「新」。藉此「扶桑社教科書／小泉參拜」的問題又更加興起，此時在

中國引起的反彈就更大了。

但是反過來說，當時很多社會氣氛也起了推波助瀾的效果，比如說扶桑社的教科書是很不妥沒錯，但是他的發行量當時僅有0.039%，也就是大部分日本人也不贊成。但是媒體沒有明確說明這一點，使有些人產生了日本學生都使用這樣的教科書的印象，這樣就使得爭吵漸漸上升，同樣的靖國神社也是如此。反過來說，日本媒體也擴大了中國的黑暗面。

問：這樣說來，也就是雙方學界甚至民間溝通的管道應該增加，反過來說，是不是現在太少了？

的確是很少，這些對話很不容易。以「東亞近現代史研究小組」為例，就能體會很多種差異，「日本侵略中國」這件事基本上大家都同意，但是表現在研究方法上就有不同。日方的學者由於受實證主義影響，通常需要給出明確的數字；但是中方更注重感情色彩或是說「立場」（不諱言的說，也許是受政治影響），基本上就會在這種問題上卡住。但是歷史研究真正的價值所在，正是發揮與民間溝通的功能。

問：說到戰爭，每年八月，日本都會舉行對戰爭的紀念，中國這邊似乎沒有相應的舉措。

中國這邊越來越有動作了，中日的紀念性質有本質上的不同。先說日本吧，日本每年舉行的紀念都是以和平民主為基礎，而且不帶有「譴責美國」的訴求，這跟美國的態度也有關係，美國也從來沒有否認原子彈的事情。而中日的情形就不這樣，由於日本有人會否認事件「本身存在」，所以中方一旦紀念，往往就要強化「這個事件確實存在」，也就把矛頭轉向批評日本。72年之後雖然淡化，但85年之後，每年12月13日都有

活動。南京在前幾年曾有人提議把「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改為「和平紀念館」，僅止於提出階段，反應就相當強烈。我個人認為不可能把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作為一個「對日抗議」的堡壘，加以低調化是未來要做的目標，但是怎麼做還是需要討論，尤其關鍵在於日方不應強調否認此一事件。

問：所長的專長正是日本右翼問題。能不能談談是什麼樣的契機使得您對於投身於右翼研究？

其實我是北京出身的，小學中學的外語項目都學的是俄語，但是80年代中期，由於日本開始提出「總清算」，中國也對應的把中日關係提升到重要位置，當時我在黑龍江社科院作歷史所長，因應這個需要就帶領一批人去開展日本研究。當我投入之後，從92年之後，每年都去幾次日本，我才發現我的想法跟實際所見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才決定把我真正看到的表現出來。不過即使如此，很多日本右翼還是認為我們近史所是「反日大本營」，把我說是「反日頭目」。

問：反過來說說看，對於日本左翼的看法。

我們現在主要能對話的對象是日本左派，但是那些人在日本被叫做「自虐派」，在日本其實不能算是多數派。雖然在戰後曾經是多數，但是經過蘇東社會主義崩潰之後，失去發言立場。就個人層次而言，現在很多「自由主義史觀者」反而以前是左派，代表性的人物是東大教授藤岡信勝，他是曾主張「南京大屠殺有五十萬受害者」的激進社會主義者。我為此曾寫過〈關於日本的自由主義史觀〉一文，主要原因可以說是「三個泡沫」的崩潰：

首先是經濟泡沫使得日本人反省之前的資本主義道路是不是有問題；其次是社會安全泡沫使得社會上由於貧困而充滿社會焦

慮，犯罪率提高，青年習性腐敗，於是就要重拾「皇國精神」；第三就是社會主義的崩潰，尤其是這些人認為社會主義才是挽救日本的道路時，居然發現社會主義的「真相」時，就連帶否定了之前的社會主義宣傳甚至是中國方面提出來的歷史。對這些人轉向其實也必須有同情的體諒，這讓我想到中國改革開放後也面臨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危機，面對價值破滅時的轉向是一定的。雖然我不贊成這種史觀，但也不認為必須拿拳頭解決。

問：最後請所長談談中國大陸現今日本研究現狀？

現今中國研究中日關係或抗戰的課題的人比較多，多數人並不懂日文，可能也無法閱讀日本文獻。其實單純從既有文獻中研究，是很片面的。往往更不用說要瞭解日本社會情況甚至更細微的文化情感因素，這樣的研究往往情緒很激動，只能複製原來的觀

點，而把調子越升越高，深層研究還必須努力。還有輿論對研究有負面作用，對研究中日關係的年輕人是種社會壓力。其實也就是兩國關係問題，關係要是不好，研究的環境也就差，這也就是我們現在的努力主要目標。

註釋

- ① 步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任所長。曾任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主要研究專業：中日關係史、東北亞國際關係史、日本侵華史、抗日戰爭史。著有：〈關於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4期。〈關於中日歷史認識問題的思考〉，《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5。《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化學戰》（專著）社科文獻出版社 2004.5。擔任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中方首席委員以及《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中方編委會負責人。
- ②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研究領域為東亞政治、中國大陸研究，E-Mail: 93260505@nccu.edu.tw。



徵稿啟事

本通訊歡迎關於中國大陸研究及教學方面的稿件。包括課程設計、教學心得、研究札記、各單位的活動簡訊、新教材或研究資料的引介、正在進行的研究計劃、及時問題討論等與中國大陸教學研究相關的課題。文長以三千字左右為宜，不須註解，並書明投稿人姓名、工作單位、職稱、聯絡地址與電話。來稿請寄 100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二十一號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或傳真至 02-2341-2806，或將電子檔案傳送至 r92322036@ntu.edu.tw「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編輯委員會」收。

中共反恐機制與作為

歐錫富博士主稿

一、中共反恐怖協調機制

中國大陸恐怖主義威脅主要為東突和藏獨與各地零星、偶發的恐怖活動。2008 年中國大陸將主辦奧運會，使得中共對防制恐怖份子威脅不敢掉以輕心。為因應恐怖份子威脅，2001 年 9 月中共中央成立「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與「國家反恐怖辦公室」。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中共建立國家反恐怖協調機制，公安部長周永康任國家反恐怖工作協調小組組長。2002 年初公安部成立「反恐怖局」，負責研究、指導、協調及推動全國反恐怖工作。各省市建立反恐怖工作的協調機制。國家安全、公安、武警、軍隊、衛生等相關部門，也建立裝備精良，素質較高的專業隊伍，準備應對方案。

2002 年中共第 1 支反恐怖特種作戰部隊—武警上海總隊反恐怖特種作戰中隊成立。東北、重慶等地亦先後成立反恐怖部隊。公安、武警負責一般反恐怖工作，包括：公安負責預防、制止、打擊犯罪、恐怖活動及危害社會治安秩序的行為；軍隊提供特種及核生化反恐支援。在執行公安相關業務方面，武警接受同級公安部門的領導與指揮。平時武警負責：①固定目標執勤。負責國家名譽警衛對象與來訪外賓、省級以上黨政領導機關、外國使領館、全國性重要會議及大型文體活動現場的安全警衛。②處置突發事件。對突然發生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的違法事件依法處置，包括叛亂、騷擾、暴亂與械鬥事件。③反恐怖。主要是反襲擊、反

劫持、反爆炸。解放軍反恐怖部隊則包括：①空軍反恐部隊。其活動很少公開。②海軍陸戰隊蛙人。目前加強海上及水中進行反恐怖鬥爭的針對性研究和訓練。③反核生化恐怖襲擊第 1 團。

二、東突恐怖活動

中共假藉美國全球反恐戰爭大肆鎮壓少數民族獨立運動，尤其是新疆的東突。中共鎮壓東突主要在於：新疆面積占全中國大陸面積的 1/6，能源、礦產等資源豐富，地緣地位重要。因此中共採取各種手段掌握新疆：①漢人移民。中共鼓勵漢人前往新疆屯墾，60 年代新疆漢人只占 5% 左右，現在超過 40%。②再教育。中共積極推動漢化教育，嚴禁鄰國伊斯蘭出版品。③改善經濟生活。改善維吾爾民眾生活條件，達成孤立激進份子的目的。④與巴基斯坦維持良好關係。避免巴國境內穆斯林資助新疆的同胞兄弟。

中共全力打擊東突，今（2007）年 1 月 5 日新疆警方搗毀 1 處東突厥伊斯蘭運動（東伊運）訓練營，擊斃 18 名恐怖份子，另逮捕 17 人。東伊運是 2002 年 9 月 11 日聯合國公布的恐怖組織，也是中共公安部 2003 年 12 月 15 日第 1 批認定的 4 個東突恐怖組織之一。這 4 個組織分別是東伊運、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及東突厥新聞信息中心。中共認為，東突恐怖組織不但得到基地組織的支持，同時也是賓拉登恐怖勢力的重要力量，而且還與阿富汗

塔利班、車臣恐怖組織等國際恐怖勢力有密切聯繫。基地組織提供給東突恐怖份子爆炸、暗殺等訓練。

三、2008 奧運反恐

北京擔心國內外因素會干擾 2008 奧運會進行，國際抵制北京奧運聲音包括：①美國及歐盟部分人士將中共對蘇丹達佛（Darfur）地區制止種族屠殺的努力與奧運掛勾，他們認為北京有能力影響蘇丹政府。②北京鎮壓異己。③飛彈瞄準臺灣。對新疆維吾爾族採取高壓政策，殖民西藏。④中共培訓體育選手採取強制訓練。⑤國際奧委會為自身商業利益而支持威權政府。⑥數百億美元將在 15 天內花掉，中國大陸卻還有無數的窮人。國內因素包括東突恐怖份子、不滿人士蓄意破壞，只要槍聲或爆炸聲一響，「中國崛起」的完美形象就瞬間破滅。

北京因而對奧運會反恐工作全力以赴，建構所謂的 4 網與 7 網。4 網是針對奧運目標和對象的防護，包括建構場館防護網（分現場區、警戒區與管制區）、駐地防護網（選手村）、路線與活動場所布控網、重點人員防護網。7 網主要是社會面的防範，包括社區治安防控網、周邊及城鄉協控網、社會面巡防網、城區監控網、網上安全監控網、單位內部防範網、特殊行業管理網。2004 年 12 月北京奧運安保協調小組正式成立，這是奧運安保工作國家級的協調領導機構。安保協調小組主要由國家安全部、公安部、武警、軍隊、外交部、海關總署、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等相關機構組成，下設安保指揮中心（北京市公安局為主體）和安保情報中心。安保指揮中心已開展要人警衛、場館保衛、防爆安檢、要害部門保衛等方面的工作。情報中心開展各項風險因素的評估、相關的背景審查、一些專業情報資訊的收集。解放軍在奧運保安工作上則擔任：①各賽區空中警

戒。②瀕海賽區及周邊賽區的海上安全警戒。③協助公安和武警部隊防範和打擊恐怖活動。④各種災害、災難的搶險救援。⑤協助做好邊境的管理和控制。⑥協助做好有關情報資訊保障工作。⑦其他需要軍隊協助的臨時性任務。

四、舉行反恐怖演習

為因應 2008 年奧運會反恐怖安全保衛工作需要，名為「長城 4 號」的反恐怖演習今年 6 月 19 日在北京舉行。「長城 4 號」反恐怖演習以處置大規模劫持人質恐怖事件為主要內容，這是繼「長城 2003」、「長城 2 號」、「長城 3 號」反恐怖演習後的另 1 次大規模演習。演習只設定劫持人質的基本情況，強調現場處置中的封控、偵察、攻擊等 3 個主要環節，真實檢驗現場指揮部的決策指揮和突擊力量的處置行動，強調實戰條件下的對抗性。這是中共今年舉行的首次國家級反恐怖演習。7 月 13 日中共另在山東青島奧運帆船中心附近海域，舉行公安海警奧運安全保障海上反恐演練，共有 9 個公安邊防總隊的 800 多名官兵，27 艘艦艇參加。

解放軍則是於 6 月 29 日在北京、天津、河北、內蒙古和山東等地舉行代號「奧安—07」演習，這是中共軍隊首次舉行奧運保安演習。演習由北京軍區負責，陸海空三軍聯合行動，分指揮演練和實兵演練 2 個階段進行。演習以「軍隊參加北京奧運安全保衛行動總體方案」為依據，全力解決軍隊參加奧運安保的指揮機制、兵力運用、行動時機、戰法對策、協同動作和情況處置等重點。透過演習，研究解決處置各類突發事件的重難點問題，提高部隊應對奧運安保的實戰能力。